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從“分歧理論”探討德國統一後的政黨體系發展

The Study of German Party System after Unification through the
"Cleavage Theory"

doi:10.30390/ISC.200806_47(2).0002

問題與研究, 47(2), 2008

Issues & Studies, 47(2), 2008

作者/Author：劉書彬(Shu-Pin Liu)

頁數/Page：25-5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806_47\(2\).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806_47(2).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從「分歧理論」探討德國統一後的 政黨體系發展

劉書彬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

1990年統一前，東德由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進行威權統治，西德則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政黨在公平的競爭制度中運作。兩德統一後，政治制度迥異的兩個體系在重整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嚴重的磨合現象。不同於以往探究政黨體系僅重視體系內單純的「相關性政黨數字」的變化，與政黨「意識形態」距離與強度的差異，本論文試著從「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出發，觀察德國統一以來，社會結構分歧程度與政黨反應此基礎所呈現的互動關係，並說明政黨勢力的興衰，如何合作結盟或是分裂解構，以呈現德國政黨體系的內涵特色。另外，也結合「政黨體系變遷」與「政黨體系分類」理論，試圖針對政黨體系的內涵，包括政黨體系變遷的成因與內容，以及對政治體系的影響做探討，來探究德國政黨體系的動態內涵。最後，也從德國政黨體系的研究歷程中，提出德國因統一而起的「整合價值」分歧，可能正在形成，進而印證分歧理論在德國政黨體系的適用性。

關鍵詞：分歧理論、德國政黨體系、政黨體系變遷、德國統一

壹、前 言

統一前的東德，由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ED, 或稱德國共產黨) 進行著威權統治；相對之下，西德為自由民主國家，政黨在公平競爭的制度中運作。1990年兩德統一後，政治制度迥異的兩個體系在重整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磨合期。

本論文的研究重點包括：政黨做為政治體系運作的重要一環，它反映了德國社會中有那些衝突勢力？政黨間的裂解 (dealignment) 與重組 (realignment) 及其形成的政黨體系又具備何種特質？不同於以往探究政黨體系僅重視體系內單純的「相關性政黨數字」變化，以及政黨意識形態差異與強度的不同，本論文試著從「社會分歧」

(social cleavage)的角度來觀察德國統一迄今社會結構分歧，與此一基礎下政黨的互動關係。此外，本文也檢視統一後德東與德西的整合程度，並試圖用「政黨體系變遷」與「政黨體系分類」理論，探討政黨體系的內涵，其中包括政黨體系變遷的成因、內容及對政治體系的影響，進而呈現出德國政黨體系的動態內涵。再者，本文亦以德國統一後的社會變遷背景，探究兩德統一後社會分歧的轉變，及其相應而成的政黨關係；換言之，本文意在說明德國政黨勢力的興衰，彼此間如何合作結盟或分裂解構。最後，本文期待從德國政黨體系的發展歷程中，探究新政黨分歧路線之形成，進而印證分歧理論在德國政黨體系的適用性。

貳、分歧理論的演變

一、社會階級衝突

1960年李普賽(Seymour Martin Lipset)的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一書，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切入，觀察到現代民主社會中，不同社群的衝突皆是透過政黨來表達，且存在著「民主階級衝突」(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①的現象。當時，李普塞只注意到社會衝突是最重要的普遍性特徵，也就是在經濟發展的社會中，多數收入較低者投票支持左派政黨；而較高收入者，則多投票支持右派政黨。^②隨後，李普塞與羅坎(Stein Rokkan)兩人於1967年合作發表「分歧結構、政黨體系與選民結盟」(Cleavage structure,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一文，將西歐各國形成穩定社會分歧的政黨體系作了系統的分類。兩人指出：因為「民族革命」與「工業革命」(the national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這兩大歷史變數的介入，歐洲社會出現宗教、社會文化、地域和經濟文化的根本差異，這構成了歐洲政治發展的四個基本衝突路線，也形成歐洲各國內部政治的歧異。「民族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浪潮下，根據其發展演變的差異，又有「中央—邊陲」(center-periphery)與「教會—國家」(church-state)的兩大類分歧。

民族革命導致民族意識的形成與民族國家的建立，相對於原本的權力支柱—教會

註① 李普賽採取「民主階級衝突」的觀念，主要沿用十九世紀以來，幾位政治思想家的想法，如：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於民主政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中強調，美國存在著特權統治(Aristocracy)，與窮人(the poor)無財產者之間的長期衝突；同樣地，馬克思(Karl Marx)也同意托氏有關階級衝突說法，尤其認為階級衝突是持續性的自然現象，但不同於托克維爾，馬克思強調階級衝突起因於有無「擁有生產工具」階層之間利益衝突，資產階級因此有著權力與文化上的宰制性，其所形成的錯誤價值共識，被無產階級者所接受，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牢固的階級衝突現象。見 Seymour Martin Lipset, "Cleavages,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Lauri Karvonen and Stein Kuhnle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Revisited*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5.

註②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1960), p. 220.

與教皇的宗教勢力，民族國家的成立也意味著世俗化權力的崛起。^③這過程裡，有些政治勢力與菁英會追求地方文化的隸屬與管轄權，但在主要的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則會出現新國家的認同。要取代次國家認同與忠誠的衝突，因此社會上持續出現了以追求中央與邊陲認同的分歧差異。李普塞與羅坎指出這差異往往以族群、語言、或是宗教人口的差異在地方或是邊陲地帶出現。這樣的社會結構差異，反應在政治上，就是歐洲政黨因此出現以「中央—邊陲」為衝突路線的政黨差異。

其次，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有些國家的信仰出現羅馬天主教與新教的分裂，部分國家則出現天主教與世俗國家的衝突，總之這種以「國家—教會」為形式的結構緊張中，愈來愈多的國家以追求獨斷的權力為主，而教會則試圖維持它在歷史上保有的權力。

李普塞與羅坎「政黨分歧」理論的第二個發展變數為「工業革命」。這個以經濟力展現的次過程下，還有兩個政治社會的分歧：「土地—工業」(land-industry)的階級衝突，是來自於擁有土地的菁英和逐漸展現實力的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其也強調馬克思(Karl Marx)提出的資本家與工人階級(capitalists and workers)的衝突，正構成一類的社會分歧，只是這類的衝突強調是由上層階級因擁有生產工具，形成權力與文化上的霸權，宰制了下來階級的价值思想而起。

簡言之，李普塞與羅坎將社會結構的分歧與政黨發展結合，認為政黨的形成立映「社會分歧」，並在政治體系中形成「政黨分歧」。政治體系內的政黨分歧並非一成不變，它以兩種方式來影響該政黨體系的內涵。一為新社會分歧的出現，來弱化已經存在的社會分歧，此舉將造成體系內政黨的重組；另一則是完全侵蝕舊有的分歧，如此將使舊政黨解構。

李普塞與羅坎的「分歧理論」之所以能長期成為研究政黨與社會結構關連性的主流，就在於階級早成為「政治衝突」、影響「政黨支持與政黨投票」的重要因素，而這模型也可以說明二十世紀以來，大部分西歐國家形成多黨體系，但美國或澳洲等採行單一選區「選擇投票」(Alternative Vote)絕對多數決制度的國家，卻形成兩黨制國家的社會結構差異。李普塞與羅坎也留意到長期以來，西方民主社會中即使許多政黨黨綱早已變更，但政黨體系卻沒有多大的變遷，根據這項觀察，因而推論出：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政黨)分歧已經制度化，政黨結盟體系已經凍結」(institutionalized and freezing of cleavage alignment)的論述。另外，社會中若有新政黨出現，它勢必是隨著社會經濟轉型的發展趨勢而興起。

「分歧」這一概念，因為李普塞與羅坎的研究，引發學者對社會結構與政黨關係的

註③ Gerd Mielke, "Gesellschaftliche Konflikte und ihre Repräsentation im deutschen Parteiensystem. Anmerkungen zum Cleavage-Modell von Lipset und Rokkan," in Ulrich Eith and Gerd Mielke (Hrsg.), *Gesellschaftliche Konflikte und Parteiensysteme. Länder- und Regionalstudien* (Wiesbaden: VS-Verlag, 2001), p. 78.

關注。今將多位重要學者對歐洲選民具有穩定傾向的研究結果，^④歸納成三大特質：一、「分歧」是人群基於地位、宗教或是種族等重要社會結構特徵差異，而出現的社會區分；二、這些人群中必定有清楚的集體認同感與利益，就如同農人、勞工、天主教徒之間因擁有眾多的同質性，會形成社會重要的影響力；第三：分歧必定有著組織性的表達管道；換言之，分歧這個字眼事實上被定義為是「社會現實」、「認同」與「組織」三方相互交互影響下的結果，它進一步會影響到政黨組成的基本差異，以及現今歐洲社會中政黨體系的轉變。^⑤

雖然李普塞與羅坎代表的「分歧理論」，成功地將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社會結構變遷、選民投票和政黨的關係做了連結，但面對 1970 年代起政黨發展的多變以及新政黨出現的頻繁，原本的分歧理論遭受到許多批評。首要的批評在於：以社會學為導向的分歧理論說明，忽略了政黨是一個公民多元利益匯集的組織，所以影響投票行為決定的「政黨認同」因素十分多元，無法僅以「二大革命性」的浪潮，來概括解釋具社會路線衝突意義政黨所代表的社會結構。其次，也有學者，例如厄文 (Derek Urwin) 指出李普塞與羅坎的理論，無法清楚定義與測量「分歧」內容所包含的「社會階級」與「宗教虔信」概念。如此一來，它就影響到社會結構與政黨關係解釋的真實性。厄文又指明：該兩人的理論也忽略「政黨本身是一個自變數」的可能性，因此政黨本身也會影響社會結構的形成。^⑥由於傳統的分歧理論將政黨視為依變數，因此論定西歐與北美的政黨體系已經於 1960 年代末就開始凍結；對此，邁爾 (Peter Mair) 明確地指出相反的事實，即從 1970 年起，選民與政黨的多變性 (volatility) 才正開始著。^⑦

另外，對於李普塞與羅坎提出「凍結的政黨體系」(frozen party system) 假設，薩托利 (Giovanni Sartori) 也批評，由於該兩人假設的有效性，是將政黨體系單純地視為一個依變數時，才可能說明各國政黨體系發展的狀況，但事實上，繼續研究政黨體系本身的轉變及其對社會、政治的影響時，這樣單純的變數關係，因為政黨體系的成因複雜而不具意義。儘管遭受前述眾多批評與質疑，「凍結政黨體系」的概念對於許多穩定的政黨體系與選舉結盟解析，依然有相當敏銳的分析效果，它可扼要說明為何該

註④ Stefano Bartolini and Peter Mair, *Identity, Competition and Electoral Availability: The Stabilisation of European Electorates, 1885-19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14-249; Stefano Bartolini,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Left, 1860-1980: The Class Cleav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5-24; Michael Gallagher, Micael Laver, and Peter Mair,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Modern Europe* (New York: McGraw-Hill, 2005), pp. 264-272.

註⑤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p. 1-64; Stein Rokkan, *Citizens, Elections, Parties*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70); Stein Rokkan, in Peter Flora, Stein Kuhnle, and Derek Urwin (eds.), *State Formation, Nation-Building, and Mass Politics in Europe: The Theory of Stein Rokk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⑥ Derek Urwin, "Political parties, societies, and regimes in Europ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litera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Oxford), No. 1. (1973), p. 195.

註⑦ Peter Mair, "Adaptation and Control: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Party and Party System Change," in Hans Daalder and Peter Mair (eds.),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London: Sage, 1983), pp. 405-429.

國之中，穩定社會結構與穩定政黨體系的高度相關性。^⑧

傳統的「分歧理論」引起許多批評，也存在一些說理上的問題，但經過許多學者的增修，目前多元內涵的「分歧理論」仍舊在「政黨與社會」關係的研究上扮演核心角色。幾十年來，新增影響政黨變遷的主要「分歧」因素為：一、人口結構轉變 (demographic shifts)、二、社會價值 (value)，與三、意識形態 (Ideology)。^⑨以下分別說明之。

二、人口結構因素

人口結構因素成爲一項分歧因素，重點在於隨著工業社會進步，物質豐裕以及職業和社會結構的急速變化，影響了西歐與美洲國家政黨體系的變遷。這項因素最初並未在二戰結束後百廢待舉最初的二十年裡出現。戴頓 (Russell J. Dalton) 指出：隨著物質的富饒，「政黨變遷」的現象遠比「政黨穩定」更明顯地成爲先進工業民主國家的一項特徵。政黨變遷也促使選民聯盟裂解，選民與政黨之間的社會心理連結出現斷裂。當先進工業主義侵蝕傳統的社會關係、社區認同時，個人之間的聯繫和機構的連結都變得具有流動性，使得建基於社會忠誠度的社會網絡，其競爭性也隨之增加。這就是戴頓所強調，於 1960~1970 年代交接時，政黨體系出現「分散性」(fractionalization) 與「易變性」(volatility of party systems) 的緣由。^⑩

戴頓提出這項「裂解的政黨體系」概念後，英勒哈特 (Ronald Inglehart) 和霍爾斯坦 (Avram Hochstein) 補充提出兩項潛在因素來說明政黨體系轉變的形式：一爲政黨體系的重組，出現在政黨與 (或) 政黨聯盟的社會基礎改變時；二則是政黨體系在政黨的崩解中發生轉變，它發生於一定比例的選民脫離傳統政黨，出現選民結構解構，或當政黨的基層組織出現衰敗時。^⑪因爲戴頓、英勒哈特與霍爾斯坦等人提出這項

註⑧ 人口結構的轉變，反應出社會結構的變遷，當然就是社會集體匯聚而成的政黨形塑不同意見的基礎。例如：二戰結束湧現的大量嬰兒潮於成年後，因爲其成長過程未經戰亂，物質條件又豐裕，因而形成的集體意見與既有的政黨社團代表意見就不同，所以許多新興政黨於 1960 年代末期崛起，自然構成社會分歧的一項成因。意識形態被定義爲「人類思想指導及政治行動的原則」。政黨基於不同的理想與理論基礎，使得其政治目標也大不相同。歐美政黨因爲對經濟現象與經濟問題解決立場的不同，而有左右意識形態的差異，右派意識形態政黨多主張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政府作最小的干預，強調自由競爭；左派意識形態政黨主張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國營企業爲經濟體制核心，強調平等正義。至於選民的社會價值的方向，則被多位學者認爲是影響工業社會中左派—右派政黨區分的核心要素。參見 Hans-Dieter Kligemann and Andrea Volkens, "Struktur und Entwicklung von Wahlprogramm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9-1998," in Oscar W. Gabriel, Oskar Niedermayer, and Richard Stoess (eds.), *Parteien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2002), pp. 507-527. 而工業社會之後的新社會結構特質會有新的價值取向出現，例如：更多自由主義取向與重視環境的價值在其中，參見 Uwe Wagschal, "Parties, Party systems and Policy effects," in Paul Pennings and Jan-Erik Lane (eds.), *Comparing Party System Change* (London & NY: Routledge, 1998), pp. 72-73; Peter M. Siavelis, "Part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ichard S. Katz and William Crotty (eds.),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Thousand Oaks: Sage, 2006), pp. 361-362.

註⑨ Siavelis, *op.cit.*, p. 363; Ronald Inglehart and Avram Hochstein, "Alignment and dealignment of the electorat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Thousand Oaks), No. 5 (1972), pp. 343-372.

觀察的發現與說明，讓分歧理論在李普塞與羅坎大環境的「社會階級衝突」結構外，又可根據人口結構因素的改變，作更細緻的「社會分歧」解釋，來說明 1970 年代起的政黨與政黨體系變遷。

三、價值因素

隨著所謂「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發展，新議題也陸續出現：強調乾淨的環境、核能的使用、創造對女性與少數族群更為友善公平的文化環境、追求更多的民主以及在家庭與性別問題上，有更多道德容忍空間的倡議與行動等，匯聚成繼「民族革命」與「工業革命」之後的第三個「後工業革命」(post-industrial)浪潮與新的社會與政治分歧基礎。英勒哈特就是這類論述的主要代表，他認為價值與「價值改變」是政黨社會基礎轉型的肇始，其後才引發政黨結盟的改變。戰後出生的新生代，並無其父執輩經歷戰亂，經濟匱乏的經驗，隨著教育機會的提升，慢慢形成了另一新型的社會路線。英勒哈特因而對此提出「後物質主義價值」(post-materialist values)的說法。

「後物質主義價值」較不重視意識形態及國家的經濟角色；較為重視非經濟性的社會議題，例如：鹽樞權、平等、參與、環境與個人道德。這些價值並不同於典型舊政治的「物質主義價值方向」(例如：經濟穩定與成長、國內秩序以及軍事與社會安全)。因此過去出現以「社會階級」為基礎的政治對立衝突，將由「價值差異」來呈現。這些價值差異也變成政黨的議題，造成有些社會團體轉型或新創，在傳統的左派政黨中另闢蹊徑或從事教育中產階級的工作，進而出現如綠黨、新左派與新政治(New Politics)的組織或社會現象。

四、分歧中的意識形態因素

不同於李普塞與羅坎將「社會階級」衝突做為「分歧」的分類內容，德國學者馮拜梅(Klaus von Beyme)提出：長期以來，政黨的「意識形態」與「黨綱」差異才是社會衝突的根源。這兩者代表著政黨的世界觀和政黨思想價值的不同。參考羅坎提出的四大衝突路線(國族、宗教、都市-農村、勞工和資產階級的衝突)，馮拜梅將其觀察到的政黨區別，依其出現的歷史順序，歸納為十大類型，分別為：

1. 自由主義政黨 vs. 舊體制(保守主義)
2. 保守主義政黨
3. 勞工黨 vs. 資產階級
4. 農民黨 vs. 工業體系
5. 區域性政黨 vs. 集中化的體系
6. 基督教政黨 vs. 世俗體系

註① Ronald Inglehart,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Rolan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註② Lipset, "Cleavages, Parties and Democracy," p. 7.

7. 共產黨 vs. 社會民主黨
8. 法西斯政黨 vs. 抗民主體系
9. 極右政黨 vs. 對抗官僚—福利國體系
10. 生態政黨 vs. 成長性社會 (Wachstumsgesellschaft)

馮拜梅認為，只要國家內部有衝突存在，就會有反應前述重要社會衝突分類的政黨存在；這歸納為十類的政黨體系分類，幾乎含括所有政黨衝突的可能類型，因此可在較細微的分類中，來簡化政黨衝突類型的複雜性，此有助於對政黨體系的瞭解。¹²⁷但面對社會中存在此類衝突分歧時，為何未有相關政黨相應存在的問題，馮拜梅試著在制度性上做解釋，例如：選舉制度以及政府體制¹²⁸差異之外，提出其他的補充理由。他認為新政黨將因為下列三項因素，較難在體系中生存下來：¹²⁹

1. 當政黨的分類和現存的政黨體系，有很高的重疊性時，新政黨不易出現。
2. 若過去存有慘痛深刻且侵蝕民主體系的歷史教訓，會讓群眾反對政黨進行裂解性的動員，因此新政黨不容易出現。
3. 當政黨與利益團體的組織高度連結，現存的政黨會被優先保護，新政黨不易竄出生存。

新政黨即使可以突破大環境的限制而成立，但下列幾個因素也會讓它的發展前景變得並不樂觀：¹³⁰

1. 新政黨與社會整合的主流立場差距太遠或太近。其命運在前者將會被認定是反體系的極端政黨（極右派或新馬克思主義政黨）；若是後者，則不易維持和他黨的分際。總之，新政黨將因這兩項因素引起社會騷動或因不容易爭取到群眾對自己穩定的支持而無法茁壯。
2. 新政黨若缺乏動員性特質的領袖人物，如：德國綠黨的費雪 (Joschka Fischer) 等，也將無法凝聚聲勢。
3. 缺乏組織性的基層組織，也無法有效開展政黨勢力。

註¹²⁷ Klaus von Beyme, "Entideologisierung der Parteien und die programmatische Annäherung der Parteienfamilien," *Parteien im Wandel* (Wiesbaden: West deutscher Verlag, 2000), pp. 70-71.

註¹²⁸ 各國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的關係解釋，最有名的是法國學者杜弗傑提出的杜弗傑法則 (Duverger's Law)，主要內容為：相對多數決制容易形成兩黨制的政黨體系，而政黨比例代表制利於相互獨立多黨制的形成，兩輪次選制易形成多黨聯盟。杜弗傑法則雖名為法則，但並非顛撲不破的自然界法則，因此當依 (Douglas Rae)、萊克 (William H. Riker)、薩托利 (Giovanni Sartori)、以及當斯 (Anthony Downs) 皆認為相對多數決制並非兩黨制的必要條件，僅能為充分條件或認為相對決會使政黨競爭規模縮小為兩黨競爭的態勢。參閱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 (台北：五南，2006年1月)，頁40。一國的政府體制採取內閣制、總統制或半總統制均可能對政黨體系的形成產生影響，例如：採總統制的國家，因為行政資源由總統獨攬，當某政黨在總統大選獲勝，就擁有該任期內最大的政治資源，因此該國的政黨會傾向於以兩黨或兩黨聯盟體系的形式出現。

註¹²⁹ Von Beyme, *op.cit.*, pp. 71-72.

註¹³⁰ Von Beyme, *op.cit.*, pp. 72-73.

參、政黨體系變遷

政黨體系是本論文的依變數，政黨體系是政黨在一政治體系中，從事競爭與合作而形成的。^①透過政黨體系的瞭解，可以說明體系中「政治資源與權力集中程度」及「政治勢力競爭的複雜性與分化程度」。因此，透過數字來表達政治體系中政黨的互動關係，可以一目瞭然地以一黨體系兩黨與多黨體系來理解政黨體系所蘊含的政黨關係。除了此種最簡單以政黨數目的政黨體系區分法外，政黨體系分類研究中，迄今還出現三種主要方法，分別依據：一、政黨滲入社會的程度；^②二、政黨的意識形態；^③三、政黨對政權正當合法性的立場來區分。^④目前一般人常使用的薩托利「政黨體系」理論，是以政治體系內的「相關性政黨」^⑤數目為基礎，配合相關性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包括意識形態的強度與政黨意識形態之間的距離）這兩個變數，形成了包括一黨體系、兩黨體系、溫和多黨與極端多黨體系的政黨區別。^⑥他的政黨體系理論，固然清晰明瞭，但對於政黨體系轉變的成因卻未做深入說明，也無法就政黨體系內部的實質

註① Alan War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47.

註② 從政黨滲入社會的程度來分，就會有與社會僅保持十分鬆散關係的政黨和與社會保持完全緊密關係的政黨，進而從這項分類標準可以看出政黨之間的競爭程度。例如：學者藍柏龍巴拉 (Joseph LaPalombara) 與韋納 (Myron Weiner) 依據政黨之間是否具備「競爭性質」來分析政黨體系，而有非競爭型政黨體系與競爭型政黨體系的區別，不過在分析競爭體系時，他們採用主要政黨是否堅持意識形態或為務實型來分類，但這對多黨體系下的眾多政黨意識形態無法完全適用，因此並非能完全說明該體系的全部特質。

註③ 馮拜梅曾經依據意識形態的不同將政黨區分為十類：激進的自由主義黨、保守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勞工黨、農民黨、區域和族群政黨、極右政黨、生態政黨。從體系內不同意識形態政黨組成的政黨體系，可以看出政黨體系呈現的特色。參見本文第二章。

註④ 政黨對政權正當合法性的立場指的是：政黨是否為反體系政黨 (Anti-system party)？若是不承認亦不接受既有的自由民主政治體制中的遊戲規則或是其掌權後將試圖改變民主政治原則，則同屬反體系政黨。共產黨與極右政黨是反體系政黨的兩種可能類型。有些地區性政黨若追求領土上的獨立，也有可能形成反體系政黨，但這和意識形態反體系政黨的成因並不相同。Ware, *op. cit.*, pp. 149-168.

註⑤ 相關性 (relevant) 政黨是以政黨的位置價值 (position value) 來決定，意即以政黨的執政取向 (governing oriented) 與反對取向 (opposition oriented) 的有無勒索潛能 (blackmail potential) 為分類標準。一個政黨只要曾經執政，或是即使未執政，但在政府決策過程中卻有杯葛阻止議案通過的潛能，就都是相關性政黨。體系中有一個相關性政黨，就是一黨體系，有兩個以上的相關性政黨就是多黨體系，以此類推之。

註⑥ 薩托利的一黨制 (single party) 包括三種：A. 不允許反對團體出現的獨一無二的政黨體系，因為該一執政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而有一黨威權、一黨務實的差別。B. 允許反對黨存在的一黨霸權 (hegemonic party) ；也因意識形態的務實與否，而有一黨霸權意識形態型與一黨霸權務實型的差別。C. 一黨優勢制 (predominant party) 已經進入競爭體系，各政黨之間公平競爭，但因為長期執政累積的資源，使執政黨擁有相當優勢的統治地位，並和若干小黨組成此一政黨體系。D. 兩黨制 (two parties) ；指體系中有交替執政的兩黨。E. 有限 (溫和) 多黨制 (limited pluralism) ；指有 3-5 黨的相關性政黨，政黨間意識形態差距不大，對政治體系的基本原則有認同感。F. 極端多黨制 (extreme pluralism) ；指有 5-8 黨的相關性政黨，其中至少存在一個相關的反體系政黨，政治體系呈現強烈不穩定性，政黨之間從事離心式的競爭。

內涵作深入分析：例如，同屬於溫和多黨體系的德國與法國政黨體系，看似應該具備相同的政黨體系特質，但實質上因各國內部環境背景差異，兩國的各政黨間，與德法兩國政黨體系的比較，就蘊含十分明顯的異質特色，這樣的實質差異若以薩托利的政黨體系理論為分析架構，實在無法做深入比較，亦無法顯示其成因或轉變的異同，構成學術研究的遺憾。因此，有必要在相關性政黨的數字分類標準下，再加上質性的政黨體系分析，才能一窺各政黨體系豐富的運作內涵與政治意義。

邁爾綜合了杜佛傑、道爾 (Robert Dahl)、羅坎與薩托利政黨體系理論的重點後，認為瞭解「政黨體系變遷」(party system change) 首要必須從政府的權力競爭是如何進行來下手，因為政黨存在的一項核心目的就是要競逐政治權位。知曉政府權力競爭的方式，就可得知政黨投入競爭的目的與政黨如何影響這權位的競爭。第二、要瞭解政黨競爭結構的改變。以台灣為例，台灣於修憲後，總統的產生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改為全民直選，並由總統獨享行政院長之任命權後，整個政治權力核心是在總統這個大位上，因此要瞭解台灣政黨體系的變遷，就須先認清各政黨是如何因應總統選舉制度的改變、如何設定政黨新的競爭目標，以致於形成黨內的精英競爭模式、政黨之間的競爭方式有何改變等，如此才有可能掌握研究的關鍵。實際觀察政府權力競爭的核心，可以各國憲政體制與規範為主，至於觀察政黨結構改變，邁爾提出幾個可分析的次項因素：²

1. 組成政府條件中「優先選項」的改變，例如：選民選擇執政黨的優先選項從原先的「維持安定」選項轉變為「清廉改革」。

2. 執政的選項是否提供不同於過去的穩定形式，而有創新形式，使競爭結構有較大的持續性變化。

3. 「誰在進行統治」的問題，與政黨成為執政黨可能性的開放程度。這影響政黨進入政府的難易度，而會改變政黨體系結構。事實上這個次項將決定新政黨成為政府一員的難易程度，也是決定該政黨體系是否為競爭體系的關鍵因素。當一個政黨體系的競爭是完全封閉或是「成為」準執政黨的政黨選項可以完全預測，也就是新政黨與新的政黨聯盟均沒有機會成為執政黨時，這個政黨體系就是封閉的政黨體系。

4. 當新的政治領袖或是政黨開始擴張而且執行新的政治選項時，也可能造成政黨體系變遷。例如：1997年英國首相在歷經近二十年保守黨執政後，於工黨選舉勝利後，由黨魁布萊爾 (Tony Blair) 接任，雖然依舊是工黨與保守黨輪流執政的情況，但因為布萊爾上台前即積極推動跨越左右兩派的「第三條路」政策路線，將工黨的意識形態屬性由原來的左派政黨，轉變為推行許多右派新自由主義思維政策的政黨，達到兼具公平正義與鼓勵競爭的發展目的因此若單就這第四個次項因素來評估，布萊爾的上台為英國兩黨體系的內涵注入了新的特質，也有政黨體系變遷的意義存在。

藉助邁爾「政黨體系變遷」理論的適用，配合薩托利「政黨體系分類」理論，可以有效針對政黨體系的內涵，包括政黨變遷的成因與內容，以及對政治體系的影響做探討，而豐富的呈現薩托利各個政黨體系性質的動態內涵。今將以德國統一後的社會變遷為背景，探究東西德統一後的社會分歧轉變情況，再來研析政黨關係、說明政黨

註² Mair, "Party System Change," pp. 65-68.

勢力的興衰、合作結盟或分裂解構，來呈現德國政黨體系的內涵與特色。

肆、德國統一後的社會分歧

柏林圍牆於 1989 年 11 月 7 日倒塌後，東西德於 1990 年 10 月 3 日統一，德國成爲一個擁有 8,100 萬且屬人口數最多的歐洲國家。加入 1,640 萬的德東居民的德國，有著兩個分隔四十五年不同社會、政治制度的區別，如今透過東德加入西德的方式於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統一，雖然透過國家條約的簽訂，於 1990 年 7 月 1 日開始建立全德的「貨幣、經濟與社會聯盟」，該年 8 月 31 日簽訂的統一條約，將東德的法律規範制度，簡單地以適用西德法規制度的方式來完成形式上的統一，但實際上東西德人民長久以來形成的主觀思考行爲差異與客觀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差異，卻非短期內靠法規制度移植就能化解。因此融合德東、德西兩區差異，就成爲統一後全德上下最艱鉅的任務。

探究 1989 年時的東西德生活水準，可發現東德住屋空間狹小，設備簡陋，房屋設備上落後西德約十五年差距，電訊設備上的差距甚至落後三十年，這都肇因於兩國個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的巨大差距（見圖 1），如：1990 年德東人約有 8,000 美元時，德西已有約 22,000 美元的水準，造成德東整體的財富規模、教育、職業訓練、消費水準和競爭實力都和德西有顯著的差異。德國統一對比之下，德東人認爲社會充滿著不公平現象，對社會萌生不滿的怨懟十分強烈。

從圖 1 的各次表看來，德東在失業問題上，只有統一初期的 1990 年，有著最低約 10% 的失業率，之後截至 2002 年該數據一直介於 14% 至 19% 之間；德西的失業率則在 7% 至 11% 之間徘徊。相對於就業的困難，每百名 20 歲到 30 歲青年人口中，大學生的比例在德東部分激增，由 1992 年 10% 的比例增加至 2002 年的 23%，這在德西也有類似由 23% 增至 30% 的情況，意味著本來已屆就業年齡的青年，面對就業不易，會以延長就學年限或是重新進修的方式，來延遲就業或紓緩失業的壓力。就國際經濟實力來比較，2003 年時德國平均國內生產毛額只達歐盟十五國平均值 99% 的水準，不僅低於後起之秀的愛爾蘭（達歐盟 120% 水準），和大國相比也低於英國的 109% 與法國的 104% 的水準。^{註 20}以上數據可說明統一後的德國經濟實力已大不如前，加上聯邦政府從 2001 年起，債務與赤字均高於歐元區凝聚標準，^{註 21}持平而論，德國已不復享有 1970 年代經濟奇蹟的盛名，反而有著嚴重的經濟問題。

註 20 Steffen Mau, "Soziale Ungleichheit in der europaischen Union,"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onn), B38 (2004), p. 40.

註 21 1999 年時，聯邦政府的債務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58.8%，2001 年爲 57.0%，之後開始緩步上升，至 2004 年 12 月，國家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毛額的 65.5%，與此相應的財政赤字達到 3.9%，連帶此兩項指標連續兩年超過歐元區凝聚標準（Konsolidierung）所訂—財政赤字不得超過 3%，與債務比重 60% 的限制。http://www.faz.net/s/Rub0E9EEF84AC1E4A389A8DC623161FE44/Doc-E972B5F1BD3048B6B0DA4BA88817A1AB-A1pl-Ecommon-Sprintsage.html, 2005/1/24, Bundesregierung, Stabilitetsprogramm 2004, Kabinetvorlage, 1.Dez.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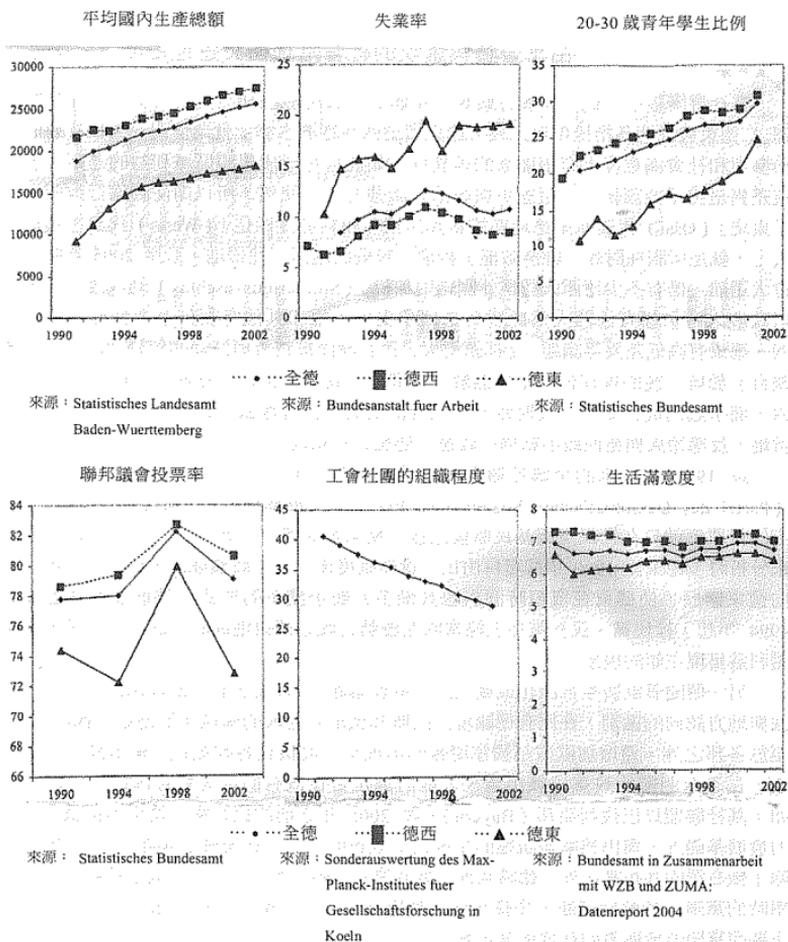


圖 1 1990~2002 年二德國的發展情勢

資料來源: Jan W. Van Deth, "Deutschland in Europa: Eine Republik zweier Kulturen?" in *Deutschland in Europa: Ergebnisse des European Social Survey 2002-2003* (Wiesbaden: VS Verlag fue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4), pp. 15-16.

統一後，德國社會普遍呈現出德東、德西經濟表現歧異的現象；現今筆者以第二章社會分歧理論的四大要素，來討論這段時期統一德國的社會分歧是否不同於統一前的西德。

一、由李普賽與羅坎的社會階級衝突途徑檢視

在社會階級中，此一社會分歧具有集體認同與組織性利益表達的衝突存在，根據圖 2 德東與德西各指標項目比較，德東與德西在經濟水準、就業情況、公民社會的政治參與和社會滿意度上有很顯著的差異性，如此自然形成集體區域利益的差距，加上這差異是由「德國統一」這歷史與政治因素強力介入使然，所以即使國家行政統一，「東佬」(Ossi) 代表原東德地區的新邦居民，相對於「西佬」(Wessi) 代表德國舊邦人士，就是所謂在財政、經濟效能上較窮、較弱的地區。連帶地，直至 2005 年聯邦議會大選前，仍有不少德西人認為「團結附加稅」(Solidaritätszuschlag) 轉成團結法案的財政收入時，僅有德西人為此多負擔此項支出；這和其他有關失業金發放基準於德西、德東有高低差異等議題，^{註 5}都讓德東人民有深深被歧視與區隔的感覺。因此「內部整合」於統一後的現在仍然是急需解決的問題，這還包括因快速統一，配套措施不完善，而引起的高失業率、高財政赤字和經濟情勢不佳等德國人最關心的問題。無可諱言地，反應德東與德西政治結構的政黨生態也大不相同。

以 1990 年以來的全國性聯邦議會選舉結果分析(見表 4)，民主社會主義黨(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PDS, 以下簡稱民社黨)從 1994 年起，在德東的得票率就只在社民黨與基民聯盟之後，穩居德東第三大黨之位；以左右政黨勢力來分析時，德東從 1990 年採用自由民主選舉制度後，自主政黨成立，德西多黨體系也向德東擴展，使德東在很短時間內也具備多元競爭體系的形式。然而多黨並起後，1994 年起，社民黨、民社黨加上綠黨的左派勢力就是德東地區的主流，意味著德東集體利益呈現左傾的現象。

另一個隨著歐盟整合深化或擴大的「歐盟議題」，因為多層次治理牽涉到歐盟、國家與地方認同的區別，在原有德國境內的聯邦與地方層級的區域(如德東、德西)，乃至於各邦之外，還增加歐盟超國家層級的治理時，需檢視各政黨在「歐盟認同」議題上，是否有明顯的政黨分歧出現，才能討論是否在既有的中央與邊陲政黨分歧中，如：基社聯盟以巴伐利亞邦(Bayern)，與 2005 年之前的民社黨以德東地區為主要勢力發展基礎外，還因為歐盟議題的生成而形成新的「中央與邊陲」議題。圖 2 顯示，除了極右派的共和黨之外，德國其他主要政黨在 1979 至 1999 年期間參與歐洲議會選舉時的黨綱，於歐盟議題上多採正面支持態度時，可以推論「歐盟議題」並未在德國主要政黨間形成顯著的社會衝突差異。

註 5 根據「第四哈茲方案」，於 2006 年 1 月 31 日前的失業者，仍舊可以請領「第一失業金」(Arbeitslosengeld I)，也就是最高可領取 32 個月薪資(以此人在失業前最後一個月的淨所得來計算)。但在 2006 年 1 月 31 日之後的失業者，則僅可以領取十二個月的「第一失業金」，而超過 55 歲者，則優惠可領取 18 個月。超過領取時限的失業者，其中有工作輔助能力者，領取「第二失業金」(Arbeitslosengeld II, ALG II)，在德西則每月領取 345 歐元，德東的失業者領取 331 歐元。至於無工作能力的家庭成員，則領取社會金(Sozialgeld)，依據當時社會金的標準發放。
<http://www.bundesregierung.de/Politikthemen/Arbeitslosengeld-II-Hartz-IV-,11826.690094/artikel/Arbeitslosengeld-II-Wer-Wie-vi.htm>, 2004/8/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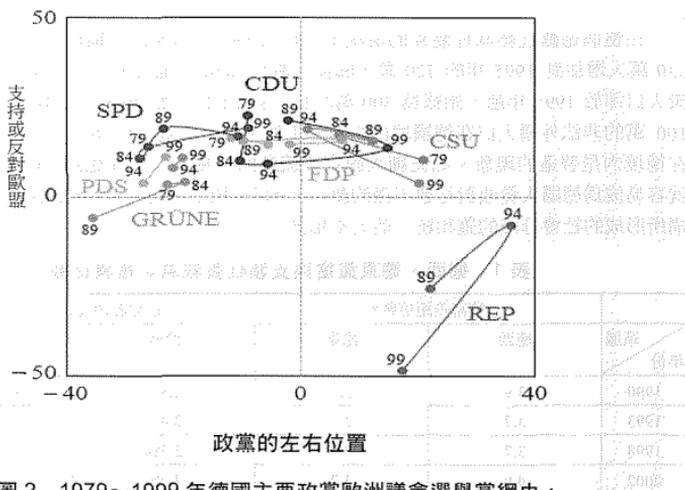


圖 2 1979~1999 年德國主要政黨歐洲議會選舉黨綱中，支持歐盟與左右政黨傾向之比較

註：SPD：社民黨、PDS：民社黨、GRÜNE：綠黨、CDU：基民聯盟、CSU：基社聯盟、FDP：自民黨、REP：共和黨

資料來源：Eigene Analysen des Euromanifest-Datensatzes; zur Berechnung vgl. H.-D. Klingmann and A. Volkens (Anm. 16) sowie Andreas M. Wüst and H. Schnitt (Anm. 17); Tanja Binder and Andreas M. Wüst, "Inhalte der Europawahlprogramme deutscher Parteien 1979-1999,"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onn), B17 (2004), p. 45.

二、人口結構方面

以就業者的收入而言，1991 年德東人的平均收入僅為德西的 57%；統一後，聯邦政府大筆資金投入德東建設，要來提升德東生活水準，截至 2001 年為止，德東就業者的收入，也已經升達到德西的 83% 水準，不過兩區之間，若再加上德東整體的失業率一直高踞在 17% 的水準時，實際上德東全區民眾的收入僅從 1990 年達德西的 69%，升到 2002 年 82% 的水準而已，其提升幅度並未如就業者的成長幅度；總之，德東與德西仍然存在著約 17% 至 18% 的收入差距，是不爭的事實，這使得德東人的身分有著「收入較低者」群體的意涵，而造成德東德西經濟差距的主因是基礎建設不足。基礎建設於統一之初，兩區就有相當差距，德東因此於 1990 年之後，成為歐盟區域結構基金下，一個主要的援助地區。此外貧富差距擴大與支領社會救濟人口數增加的現象如表 1 所示，意味著貧窮人口在兩區的增加，這樣的趨勢在德東尤其顯著，代表著德國社會不穩定的風險因子增加。貧窮人口中又以單親家庭、多子家庭、失業人口、移民者、20 歲之下的年輕人以及缺乏綜合高中學歷的人士這六類為社會中的高風險人物。

註⑥ Rainer Geissler, "Struktur und Entwicklung der Bevölkerung," *Informationen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Themen: Sozialer Wandel in Deutschland (Bonn), Band 269 (2004), p. 13, 20.

⑦

在整個德國社經條件變差的情況下，於 1990 年即開始大幅增加的外籍人口，從 530 萬人增加到 1995 年的 720 萬，隨後一直到 2003 年都維持在 730 萬的數字，其就業人口卻於 1995 年起，始終為 300 萬左右，^⑧加上估計於 2000 年初期，約有 15 萬至 100 萬的非法外籍人口在德國境內生活與工作，持平而論，50 萬非法外籍人口長期留在德境內是普遍的現象。如此龐大固定或流動的外籍人口，在德國社經情勢不佳時，就容易成為德國人發洩對社會不滿的藉口。^⑨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德國統一後，人口結構所形成的社會分歧的確和統一前大不相同。

表 1 德西、德東貧富與支領社會救濟之差異比較

年份 \ 區域	貧富差距倍數*		社會救濟金的人口比例	
	德西	德東	德西	德東
1990	3.9	2.6	2.8%	1.4% (1991)
1993	3.7	2.7	3.4%	1.8%
1998	3.7	2.9	3.7%	3.0%
2002	4.0	3.2	3.2%	3.0%

註：*平均收入最高 1/5 者對收入最低 1/5 者的倍數差距比較。

資料來源：Rainer Geissler, "Struktur und Entwicklung der Bevölkerung," *Informationen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Themen: Sozialer Wandel in Deutschland (Bonn), Band 269 (2004), p. 17, 20.

三、社會價值方面

前述根據各家分歧理論而做出的分析，亦可以從圖 3、圖 4 德東、德西社群 (soziale Milieus) 的分歧差異而察知。社群研究為一新型調查德國社會結構的分析法，「社群」在此被定義為：生活觀念與生活方式相似的人群，其亦在一社會內部形成相同的次級文化單位。也因為如此，該研究方法可以將客觀的生活條件、社會地位與和生活環境連結的主觀生活觀念、行為方式乃至於生活機會結合。意即透過組織化的「社群」概念可以區分出不同人們的價值取向、生活目的與方式，乃至於其對工作、休閒、消費和家庭與夥伴關係，而發掘出其基本價值的差異。

圖 3、圖 4 中，德西與德東社會地位和基本價值研究調查中顯示：在以收入構成社會高低差異的兩社會中，實際社會價值的多元性與區別性遠多於只以社會階層高、中、低分類所呈現的價值分布情形，呈現現代社會文化多樣性的特質。其中約 1/5 德西人口比例的高社會地位者中，自營商社群多具備濃厚的傳統價值傾向，而另一部份則是知識份子社群，具備較強的生態與個人主義意見。德東高社會地位者的社群意見則廣泛地從重視市民一人文價值傾向、保守主義，乃至於到公職與政界人士社群，其

註⑦ Geissler, *op.cit.*, p. 30.

註⑧ 此為根據「德國多種族社會人口發展」圖所改寫的文字內容，附圖來源為：Rainer Geissler, "Lebenssituation ethnischer Minderheiten," *Informationen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Themen: Sozialer Wandel in Deutschland (Bonn), Band 269 (2004), p. 40.

註⑨ Geissler, *op.cit.*, p. 41.

社群意見有著較高的成就與親西方價值色彩。較為特殊的是存在著緬懷前東德制度價值的社群，這些人多曾是前東德的政治領導階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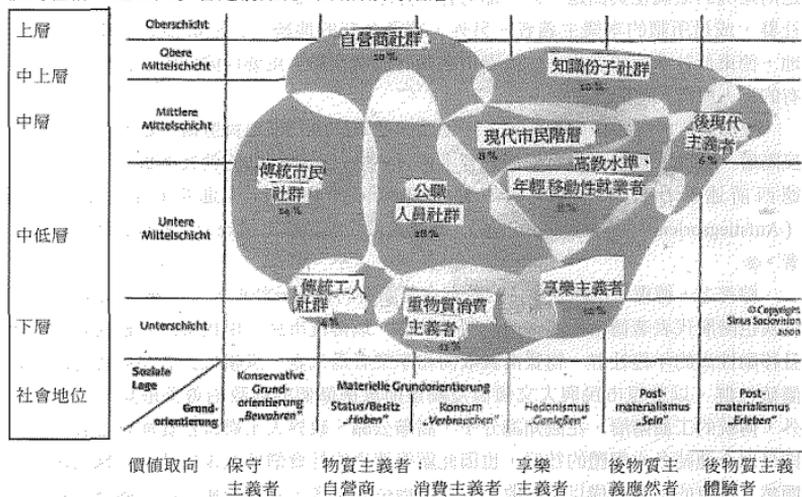


圖 3 2000 年德西民眾的社會地位與基本價值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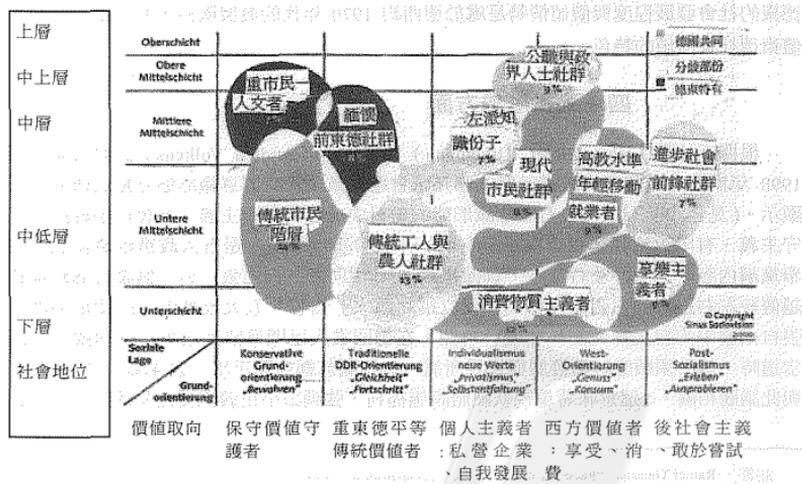


圖 4 2000 年德東民眾的社會地位與基本價值方向

資料來源：Rainer Geissler, "Facetten der modernen Sozialstruktur," *Informationen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Themen: Sozialer Wandel in Deutschland (Bonn), Band 269 (2004), pp. 72-73.

低社會地位階層人士在德西約有四分之一人口，在德東約三分之一的人口比例。這兩區塊的價值差異倒是不大，都約有十分之一人口屬於重視物質主義，消費至上的社群，或是所謂的享樂主義者。另外，德西各邦的傳統工人社群卻急速萎縮；相對地，德東低社會地位者中，工人階級意識的驕傲和農人重要性的強調，卻構成德東特有的工人與農人社群價值。

至於廣大的社會中層地位者，在德西與德東的多元性更為豐富。德西是以現代市民階層、公職人員社群與具備高教育水準、年輕且移動性強的就業者為主。德東則在德西前述的社群外，還有著左傾的知識分子與一群「進步社會前鋒社群」(Aufstiegsorientiertes PionierMilieu)，其算是最先倡議或支持統一，而成為統一的受益者。³⁰

綜言之，德東、德西社會中的確存在著顯著的社會分歧形式，以圖4來解釋，中度灰色階層代表著德東德西共同的價值社群，以傳統市民、現代市民、較高教育水準且移動性高的年輕社群、物質消費取向和享樂者為代表。黑階代表著德東特有的社會價值社群，以重視市民與人文價值及緬懷前東德價值的前政治菁英最具代表性。另外，傳統的工農階層、左派知識分子、高階公職、政界人士與具社會前鋒意義的社群則是聚合連結各方團體的社群，也因此顯得德東的社會價值並未向德西一樣的聚合。顯然，德東的社會結構以中低收入的社会地位者為多，基本價值上則是兩個多數集團分立：一為兼具西方「個人主義」重視「私有化」與「自我發展」以及西化享樂思想的人群；另一則是兼具身為「保守主義」守護者與東德傳統價值的人群。比較而言，德東的社會發展程度與價值情勢是處於德西約1970年代的發展階段，其中部分具有緬懷東德社會價值的特色。

四、意識形態方面

根據克林曼(Hans-Dieter Kligemann)與福肯斯(Andrea Volkens)針對1948至1998年期間，彙整五大政黨於歷次聯邦議會選舉黨綱後有關意識形態分類的研究結果顯示，(見表2)五項代表右派意識形態的項目中(強調自由主義、社會市場經濟、保守主義、有限福利國家和重視軍事安全)，「社會市場經濟」是五大政黨經濟領域的選舉黨綱內容中，不分左右黨派，具備超過55%傾向的共同主張。另一個讓五個政黨跨越傳統左右路線的主張是左傾的「建立福利國家」內容。五大政黨中，即使是強烈主張自由競爭的自民黨與基民和基社聯盟，在德國進入已開發國家之列、福利國家思潮當道時，都必須順應時勢發展與民眾所需。其相關黨綱中顯示出，94.4%以上的內容都與此議題相關。³¹這意味著重視軟硬體設施福利、強調公平正義與促進生活條件差異整

註³⁰ Rainer Geissler, "Facetten der modernen Sozialstruktur," *Informationen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Themen: Sozialer Wandel in Deutschland. (Bonn), Band 269 (2004), pp. 72-74.

註³¹ Hans-Dieter Kligemann and Andrea Volkens, "Struktur und Entwicklung von Wahlprogramm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9-1998," in Oscar W. Gabriel, Oskar Niedermayer, and Richard Stoess (eds.), *Parteien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2002), p. 521.

合的左派核心價值，已經成為不分左右政黨差別的社會主流了。不過即使各黨均重視「福利國家」議題，但卻因為實踐福利國的立論基礎與途徑方式不同，而能各自吸引選民支持。

另外，社民黨在「保守主義 vs. 文化多元主義」的右左意識形態差別上，四十四年之間的選舉黨綱資料卻顯示高達 87.8% 比例的內容與保守主義有關，出乎人們意料之外；與此相對地，自民黨在軍事與安全議題方面，69.1% 的內容比例傾向以「和平與裁軍」來表現其對外政策，這也就形成其穩坐右派陣營，但在長期外交政策上可與左派政黨合作的基石。簡言之，由於五大黨均強調「社會市場經濟」，並在建立「福利國家」的基礎上推動重大政策，這就形成德國政治上非常重要的政黨共識基礎；所以統一後德國是一政黨間意識形態差異溫和的多黨政黨體系，就十分清楚。

表 2 1948~1998 年五大政黨在左右議題立場上的平均分佈差距

		民社黨 a		綠黨 b		社民黨		自民黨		基民/基社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自由	民主	33.3	66.7	51.2	48.8	39.0	61.0	65.9	34.1	69.1	30.9
社會市場經濟	計畫經濟	55.4	44.6	73.0	27.0	87.6	12.6	99.3	0.7	99.1	0.9
保守主義	文化多元主義	39.1	60.9	40.2	59.8	87.8	12.2	54.5	45.5	98.3	1.7
有限福利國家	建立福利國家	0.0	100.0	0.6	99.4	1.2	98.8	5.6	94.4	3.7	96.3
軍事的安全	和平與裁軍	0.2	99.8	0.1	99.9	30.3	69.7	30.9	69.1	62.4	37.6

註：a：民社黨為 1990~1998 年的資料。

b：綠黨為 1983~1998 年的資料。

資料來源：Hans-Dieter Kligemann and Andrea Volkens, "Struktur und Entwicklung von Wahlprogramm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9-1998," in Oscar W. Gabriel, Oskar Niedermayer, and Richard Stoess (eds.), *Parteien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2002), p. 521.

伍、統一後的政黨分歧與政黨體系

根據邁爾的「政黨體系變遷」理論，瞭解政黨是如何競逐政府權力的方式，就可得知政黨運作的核心—政黨投入競爭的目的與互動的形式，進而掌握政黨是如何主導政黨體系變遷的脈絡。由於德國政府屬於議會內閣制，因此競逐聯邦議會多數席位進而取得聯邦政府執政權是各主要政黨的政治目的，加上德國又為一聯邦國家，地方邦議會的結構將反映到聯邦參議院影響政府立法的通過，所以本章將藉由政黨在首要的政治競爭場域—聯邦議會選舉，以及次要的地方邦議會選舉結果，來探究統一後的德國其社會分歧與政黨體系發展關連性。

這段時期德國政黨發展對德國社會結構變化的反應，可由歷屆的聯邦議會選舉結果約略看出一些端倪。

表 3 1990~2005 年聯邦議會選舉得票率與議席分配結果

	1990		1994		1998		2002		2005	
	%	席位	%	席位	%	席位	%	席位	%	席位
投票率	77.8	662	79.0	672	82.2	669	79.1	603	77.7	614
基民／基社聯盟	43.8	319	41.4	294	35.1	245	38.5	248	35.2	226
社民黨	33.5	239	36.4	252	40.9	298	38.5	251	34.2	222
自由黨	11.0	79	6.9	47	6.2	43	7.4	47	9.8	61
綠黨	5.1 ¹	8	7.3	49	6.7	47	8.6	55	8.1	51
民社黨 ²	2.4	17	4.4	30	5.1	36	4.0	2	8.7	54
共和黨	2.1	-	1.9	-	1.8	-	0.6	-	0.6	-
德國共產黨 ³	-	-	-	-	-	-	-	-	-	-
德意志帝國黨	-	-	-	-	-	-	-	-	-	-
德國國家民主黨	0.3	-	-	-	0.3	-	0.4	-	1.6	-
GB/BHE ⁴	-	-	-	-	-	-	-	-	-	-
德國黨	-	-	-	-	-	-	-	-	-	-
巴伐利亞黨	0.1	-	0.1	-	0.1	-	0.0	-	0.1	-
中央黨	-	-	0.0	-	-	-	0.0	-	0.0	-
其他	1.7	-	1.7	-	3.7	-	2.0	-	1.7	-

註：1. 西德綠黨 3.8%，聯盟 90／東德綠黨 1.2%。

2. 2005 年為左黨－民社黨。

3. 至 1953 年為德國共產黨 (KPD)，1972 年後為德意志共產黨 (DKP)。

4. GB/BHE: Gesamtdeutscher Block / Bund der Heimatvertriebenen und Entrechteten。全德同盟／被驅逐故鄉者與權利被剝奪者聯盟。

資料來源：<http://www.wahlrecht.de/ergebnisse/bundestag.htm>, 2006/10/29

一、從政黨個體微觀層面討論政黨體系

(一) 綠黨崛起而執政

從社會變遷角度來看，隨著二戰後新興中產階級進入企業成為白領工作人員或受聘於政府機構，這年輕一代感受於物質富裕社會對生態破壞與人類價值物質化造成的負面危機，進而形成對 1960 年代末期執政黨與優勢利益團體掛勾和政治決策對環境改善缺乏有效回應的不滿與反省，除了導致「政黨厭惡」(Parteienverdrossenheit) 外，也累積能量促使當時的西德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學生運動與 1970 年代出現的「公民倡議」(Initiative) 運動和思想行為上較為激烈的「替代選擇」(Alternative)，成為反映國際情勢東西對立和解、反對核廢料與主張生態保護議題當道的社會團體。²⁰

註²⁰ 郭秋慶，德國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台北：志一，1996 年 4 月），頁 229-233。

自 1977 年起「綠色名單，環境保護」(Grüne Liste Umweltschutz, GLU)首先在漢堡、布萊梅與北德幾邦形成地方勢力，並形成以「綠色」為名的選舉名單聯盟，在參加 1979 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 3.2% 的得票率。1980 年 11 月，綠黨在卡爾斯魯爾 (Karlsruhe) 成立，當時的黨員僅有一萬名，後來陸續參加各地的邦議會選舉，均獲得議席，及至 1983 年以 5.6% 的得票率，取得聯邦議會 27 個席位，打破了 22 年由基民/社社聯盟、社民黨與自民黨長期壟斷西德政治的情況，綠黨在聯邦議會這樣的地位一直持續到 1998 年，其與當時的第一大黨社民黨聯合執政，因此也成為具有執政經驗的政黨。使得德國政黨體系的相關性政黨數，從原有的基民和社社聯盟、社民黨與自民黨的溫和三黨體系，轉變為包括了綠黨的溫和四黨體系。

綠黨執政對德國政黨體系的影響，在數量變化上的意義尚不及其對政黨體系內涵所帶來的影響。綠黨在德國政黨體系發展的最大影響有二：一是綠黨成為人類與自然生態關係中的反省者。綠黨的崛起適時填補了過去傳統型政黨面對後工業化社會無法提供解答的真空，以「分權化的政黨組織」、「基層民主」與「男女平等」三大原則來組織其政黨結構。在政黨意識形態上則強調「新政治」，是在自由、公正與團結互助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生態與社會平衡的經濟。除了環保生態外，隨著其愈接近選民，留意到民主需求與創造和平環境的必要性，選舉黨綱內容也隨之豐富起來，並連結著直接民主、經濟民主、性別平等品質的主張與落實，都讓其逐漸由單一生態議題的政黨，轉變為全方位的政黨。

第二個影響則是促進了德國政黨政治光譜的擴大。這一反應社會價值轉變的綠黨擠壓了原有三大政黨的生存空間。隨著選民環保意識的提升與民眾對原有政黨積習難改的厭倦，從生態觀念出發的綠黨，承認人類融合於自然界的整體性以及自然環境的價值獨立性，進而衍生出尊重物種與文化社會多元性的價值追求，這一非資本主義與非社會主義的「綠色」第三條道路，構成綠黨建立人類未來社會的理想國藍圖，也透過參與型的基層民主體制，防止機構與個人的權力壟斷。

無論從李普塞、羅坎的「社會階級衝突」路線分析中，綠黨被視為是「後工業革命」出現的代表；或是依據英勒哈特「價值」分歧理論，綠黨是具有保護生態、強調女性主義以及和平非暴力、重視草根民主「後物質時代」價值的政黨，甚至從馮拜梅的「意識形態」分歧出發，綠黨是生態運動代表的身份。前此種種我們都可以看出因為綠黨執政，對德國政黨體系內涵改變的影響與意義。

(二) 社民黨的分裂與民社黨的重組

1989 年，社民黨針對基本黨綱做了大幅的修訂，重點是要推動社會公平福利與重視生態的發展政策。但這黨綱修訂的可能成果，卻因 1990 年全德統一議題的席捲而無從檢驗，並重挫了 1990 年當時藉由黨綱修訂整合完畢，信心滿滿準備大舉接收左派各勢力的社民黨聯邦總理候選人拉方田 (Oskar Lafontaine) 的政治前途。急速統一所帶來的後遺症，讓經濟情勢趨壞。1991 年上半年尚有七成五選民支持三大政黨，但到了

註③ 在 1977 年漢堡與下薩克森邦議會選舉中，綠色名單與彩色名單 (Bunte List) 團體共獲得 4.5% 與 3.9% 比例的政黨得票率，雖然未能一舉突破 5% 門檻限制，但已引起議會中三個主要政黨的注意。

1993 年年中，三大黨僅能動員投票率人數約二分之一比例的人口，這種不滿首現於德東人民對經濟表現不佳，與對統一過程不滿所產生的嚴重失望；德西則對庇護問題的處理，迭有怨言。對此社民黨內部也有不同聲音，1993 年 6 月社民黨和執政聯盟達成的「庇護妥協」(Asylkompromiss)^③，也讓人覺得社民黨喪失了保障扶助弱勢的基本立場。

本來承受許多社會不滿責難的右派執政聯盟，在 1993 年不被看好，但因 1994 年德國經濟稍微好轉，並在較好的政黨選戰謀略下，基民聯盟主席柯爾(Helmut Kohl)與社民黨主席夏平(Rudolf Scharping)的選戰競爭中，還因社民黨在前述庇護政策議題處理的不當，及總理候選人不夠突出的情形下，造成基民和基社聯盟與自民黨險勝，繼續執政。1994 年大選失利後，選戰當時形成的「三巨頭」(夏平、拉方田、施略德)不再團結而各自競逐黨內大位。拉方田於 1995 年 11 月再度取得黨主席位置，代表社民黨堅持傳統左派的勢力。過去黨內歧異的分支和具有各邦實權的社民黨籍各邦總理，之後也都在有效整合與政黨紀律要求下，要求以民調來決定聯邦總理候選人^④。最後由已經連任多屆下薩克森邦總理的施略德(Gerhard Schröder)小勝一籌，取得代表社民黨於 1998 年挑戰柯爾總理的地位，並與拉方田成為雙重領導人的選戰主軸，這樣不同調性的組合被媒體稱為「兼具緊張與建設性效果的雙元主義」(konstruktiver Dualismus mit Spannungseffekt)^⑤。

施略德於 1998 年選戰中以「新中間」(die Neue Mitte)^⑥路線為主軸，贏得選戰。自此社民黨形成兩股大勢力：一為重視傳統社會主義思潮的勢力，另一為以利益為導向的市民投票者。由於社民黨 1998 年的勝選來得太突然，在缺乏政綱路線內部討論的準備下，儘管拉方田在內閣已取得財政部長之位，但施略德路線的爭執仍導致社民黨內出現嚴重的人事鬥爭，繼而引發 1999 年 3 月拉方田的辭職(聯邦財政部長與黨主席)，後由施略德接任黨主席形成黨政合一。^⑦之後，拉方田便在社民黨內部尖銳批評施略德的施政，也將政治關注的重心部份移轉至德東地區，2003 年 9 月更建議德東的社民黨應和民社黨合併。拉方田因無法認同社民黨執政後向財團勢力靠攏，認為其遠離了原先社民黨的立黨宗旨，於 2005 年 3 月離開了社民黨，隨後組成「選舉替代選擇—勞動與社會正義黨」(Die Wahlalternative Arbeit & Soziale Gerechtigkeit, WASG，

註③ 這其中談到三原則：該庇護者必須來自經由確定的第三國、以及是來自於明確出發的母國，而且必須藉由航空器抵達德國。如此高門檻的庇護者申請條件，根本是要阻卻庇護者成為合法的申請者，而因不能解決問題而飽受批評。http://de.wikipedia.org/wiki/Asylkompromiss, visited by 2007/8/22

註④⑤ Oskar Niedermayer, "Nach der Vereinigung: Der Trend zum fluiden Fünfparteiensystem," in Oskar W. Gabriel, Oskar Niedermayer, and Richard Stöss (Hrsg.), *Parteien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Bonn: bpb, 2001), pp. 111-118.

註⑥ 社民黨 1989 年的選舉黨綱，的確像英國工黨一樣，有著追求推動「第三條路」核心價值—「平等」、「機會」、「責任」與「社區」等理念所進行政策的身影。例如：以「強化經濟、創造新工作機會」為主體架構的政綱，標示了面對全球化及歐洲統合的契機下，各項供需條件的配合，需要促成投資，並降低民眾負擔。其政策主要透過教育科技能力提升、公平稅賦、家庭與福利政策、與綠黨加入執政團隊凸顯的生態現代化政策、及德國內部整合的完成、外交政策上致力加速歐洲的擴大與深化來實踐。

註⑦ Niedermayer, *op.cit.*, p. 120.

以下簡稱勞動社會正義黨)，要挖社民黨的牆角，爭取社民黨左翼中不滿施略德中間路線的人士入黨，形成社民黨的分裂。

1990年，由原東德共黨改組成立的民社黨，經由其在德東地區獲得直選三席聯邦眾議員的條件，以黨團身分分配政黨議席，參與了全德政治決策，使得進入聯邦議會的政黨數目，由四個變成五個。之後民社黨內關於路線與理念的討論依舊未曾停歇，直到1993年，通過了全新的黨綱，針對社會、經濟、科技、生態、文化方面做了全盤發展方針的修正，準備朝全國型政黨方向邁進。1994年的聯邦議會選舉中民社黨獲得4.4%得票率，雖未超過5%門檻，但較前一屆的2.6%進步，並以獲得四席直接議席的資格，而取得30席政黨名單議席^{註37}；1998年民社黨於聯邦議會選舉中，首次以5.1%得票率跨過5%門檻，獲得36席議席^{註38}。但2002年大選卻因種種內外不利因素，民社黨遭逢空前的挫敗。在全國得票率方面民社黨僅獲得4.0%，另一直接議席當選資格也只贏得2席，而無法分配聯邦議會的政黨席次。這次大敗使黨內路線與政策的爭議再度浮上檯面。黨員們除了要求加速進行自2001年開始討論修訂的黨綱外，也明確希望民社黨的形象能與社民黨有明顯區隔。2003年的黨代表大會再次選出畢斯基(Lothar Bisky)為黨主席，同時也通過了因應全球化與歐洲統合趨勢的黨綱，來迎接新世紀的挑戰。

2005年這個提前大選的選舉年，德國左派勢力發生大地震。該年3月拉方田組成「勞動社會正義黨」，造成社民黨內部結構失血。之後，5月底北萊茵西發里亞邦(Nordrhein-Westfalen)議會選舉社民黨喪失長期的執政地位，連帶影響聯邦參議院的三分之二席次由基民和基社聯盟所掌握，具備否決聯邦政府施政的能力，進而動搖社民黨在聯邦政府的執政地位。提前大選的脚步接近時，拉方田與同屬左派且具有德東地區身份的民社黨領導人居西(Georg Gysi)開始建立起合作關係，兩個在德西德東各具有勢力或潛力的政黨，試圖透過對方之力，要合組「全德左派組織」，一舉突破過往或未來由社民黨與綠黨囊括所有左派勢力版圖的情況。2005年7月17日，前述兩個左派政黨決定以「左派-民社黨」(Die Linke- PDS, 簡稱左黨)的名義，提出共同的提名名單參與該年9月18日舉行的聯邦議會選舉。選舉結果顯示，東西合擊的左黨獲得8.7%的得票率，一舉超過當時執政聯盟綠黨所獲得的8.1%選票支持，成為國會第四大黨(見表3)。若非左黨選前即聲稱不加入任何執政聯盟，要以自身實力讓社民黨反省，加上其比綠黨與社民黨更為左傾的意識形態，不然以2005年大選結果，三個

註37 Karlheinz Nießlau, Das Parteiensystem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ine Einführung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2), p. 131.

註38 根據聯邦選舉法，聯邦議會選舉中政黨只要能通過5%門檻條款或是贏得3席以上直接議席便能夠依比例分配聯邦議會中的席次。歷屆聯邦議會選舉結果 in <http://www.wahlrecht.de/ergebnisse/bundestag.htm>, visited by 2007/08/17

註39 歷屆聯邦議會選舉結果 in <http://www.wahlrecht.de/ergebnisse/bundestag.htm>, visited by 2007/08/17

註40 內部因素為民社黨的政治明星居西(Georg Gysi)涉入2002年7月爆發的「紅利車程醜聞案」(Bonusmeilen-Affäre)，大大影響社民黨的聲望，同時也因中間偏左由社民黨與綠黨聯合政府政績不佳而拖累；加上該次選舉德國首次舉辦總理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整個選戰被媒體塑造成社民黨施洛德與基民和基社聯盟史托柏(Edmund Stoiber)對決的形象，小黨多被民眾忽視，因此得票率大幅滑落。

主要左派政黨（社民黨、左黨、綠黨）的總得票率高達 51%，的確比兩個主要右派政黨（基民／基社聯盟＋自民黨）合計 45% 的得票率來論，選後若左派各政黨齊心合作，未必不可能組成一個左傾聯合政府。

新政黨的出現，反應社會中潛藏著和原政黨不同類型的意識形態，這樣的假設由後來的政局發展中獲得證實，即透過跨區域的政黨結盟，和德東原來的民社黨合作後，這新生政黨一舉在全國性的聯邦議會選舉中衝到第四大黨的位置，不僅存續下來，還能影響聯合政府的組合形式。實質上它已經使德國政黨體系相關性政黨數字由四增為五，也意味著當時新創的「勞動正義黨」或是重組的「左黨－民社黨」意識形態，確實在 2005 年選戰中和社民黨有所區隔。至於 2005 年左黨於德東與德西所獲選票，是否多數是從原社民黨的選票瓜分而來，從表四兩黨得票率的數字消長來看，似乎有某種程度的因果關係。然而，它是否能就依此斷定事實正是如此，恐仍須出口民調的相關結果加以對照檢視。德國「左派－右派」這一項主要的社會分歧仍然存在時，若以七、八成的可能性來說明「2005 年左黨在德東、德西的票源多從社民黨轉向而來」，應屬「雖不中亦不遠」的判斷。左黨於這次選戰首役獲得漂亮的成果，根據馮拜梅對新政黨發展能否維繫的原因來檢視，應該也可說明它們是透過有組織的政黨形式參與選戰，尤其拉方田煽動性的言論與個人魅力吸引和撼動群眾，讓這個新成立的政黨，緊扣民眾對社民黨右傾的不滿情緒，進而把握國會提前改選，利用各黨準備時間不充裕的機會，主動和德東的民社黨合作，才創造出在聯邦議會的生存空間。

拉方田從社民黨出走另組「勞動社會正義黨」，意味著社民黨的分裂。兩年左右的合作期間，拉方田先於 2005 年 9 月 23 日擔任聯邦議會左黨的黨團主席，再促社會勞動社會正義黨（2007 年 6 月 16 日）與左黨合併，重整後以「左黨」為黨名，拉方田稍後選與畢斯基雙雙被選為該黨的主席。剛合併的左黨擁有 74,500 黨員，其中六萬名來自德東，一萬四千多名來自德西。2006 年 3 月，左黨於德東薩克森－安哈特邦（Sachsen-Anhalt）的得票率，從四年前的 20.4% 上升至 25.2%。此外，2006 年 11 月在柏林市則繼續與社民黨聯合執政，更引人注目的是 2007 年 5 月布萊梅市議會的選舉，該黨獲得 8.4% 得票率，超越了自民黨的 6.0%，突破民社黨以往在德西邦議會中零議席的紀錄。2008 年 1 月 27 日左黨以 7.1% 得票率首度進入德西下薩克森邦議會，同日左黨再於黑森邦選舉獲得 5.1% 選票；2 月 24 日漢堡市議會選舉的左黨得票率為 6.4%。2008 年春天，左黨在德西三邦選舉均突破議席分配的 5% 得票門檻，顯示左黨在德西已經有一定的支持度，甚至在黑森邦與漢堡市選因其擁有一定的議席，而成為影響左派政黨是否能順利組閣的關鍵，其影響力已經不容小覷。

總之，左黨以新政黨的組織型態出現，除了在德東地方選舉中擴展實力站穩了腳步，並在德西的布萊梅、下薩克森、黑森與漢堡攻下幾個橋頭堡。它的黨綱強調著「民主的社會主義」（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特色，似乎在諷刺左派大黨社民黨的無能，並積極展現搶攻社民黨票源的雄心。尤其在 2007 年與社民黨觸及 2009 年聯邦議會大選合作的可能性時，左黨標榜縮短工時，透過生態與社會結構轉變來創造就業機會，還強調提高生產效率，來保障公平的生活水準；加上更有效的財稅改革，提

高企業、高所得與遺產稅收，提供充裕社會福利的保證，以及主張德國自阿富汗撤軍等，都和社民黨中間偏左，立場搖擺，無法落實保護弱勢族群的形象有明顯區隔。這也是該年 8 月中旬，左黨聯邦議會黨團主席居西於接受德國第二電視台訪問時，自認為目前的社民黨對左黨而言，於 2009 年大選不具聯合執政能力的理由。^④

表 4 1990~2005 年德國主要政黨於聯邦議會的分區選舉得票率

年代	區域	基民／基社	社民黨	自民黨	綠黨	左黨	極右政黨
1990	全國	43.8	33.5	11.0	5.0	2.4	
	德東	41.8	24.3	12.9	6.2	11.1	
	德西	44.3	35.7	10.6	4.8	0.3	
1994	全國	41.5	36.4	6.9	7.3	4.4	
	德東	38.5	31.5	3.5	4.3	19.8	
	德西	42.1	37.5	7.7	7.9	1.0	
1998	全國	35.1	40.9	6.2	6.7	5.1	共和黨 1.8 國家民主黨 0.3
	德東	27.3	35.1	3.3	4.1	21.6	
	德西	37.0	42.3	7.0	7.3	1.2	
2002	全國	38.5	38.5	7.4	8.6	4.0	共和黨 0.6 國家民主黨 0.4
	德東	28.3	39.7	6.4	4.7	16.9	共和黨 0.5 國家民主黨 1.2
	德西	40.8	38.3	7.6	9.4	1.1	
2005	全國	35.2	34.2	9.8	8.1	8.7	共和黨 0.6 國家民主黨 1.6
	德東	25.3	30.4	8.0	5.2	25.3	共和黨 0.4 國家民主黨 3.6
	德西	37.5	35.1	10.2	8.8	4.9	

資料來源：根據 1990-2005 歷次聯邦選務主管 (Der Bundeswahlleiter)，聯邦統計局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的網頁資料整理而來。

(三) 極右派政黨於邦議會選舉嶄露頭角

聯邦選舉之外，筆者試著也檢視邦議會選舉結果，是否也由前述五個政黨在主導地方時政。結果顯示，共和黨 (Die Republikaner Republikaner) 曾於 1992 年於德西的巴登-伏騰堡獲得 10.9%，1996 年則又獲得 9.1% 的得票率。至於德國民族聯盟 (Deutsche Volkunion, DVU) 則於 1998 年德東的薩克森-安哈特邦取得 12.9%，再於 1999 年於德東的布蘭登堡邦獲得 5.3%，以及 2004 年的 6.1% 選票。國家民主黨 (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NPD) 於 1995 年德西布萊梅的市議會選舉中獲得 10.7% 選民支持，並於 2004 年德東薩克森邦取得 9.2% 選票比例。最近的發展則是，2006 年德東的麥克倫-佛門門邦 (Mecklenburg-Vorpommern) 議會選舉中獲得

註④ "SPD ist für uns nicht koalitionsfähig." Gregor Gysi über Koalitionen und die Lage in Afghanistan, <http://www.heute.de/ZDFde/inhalt/18/0,1872,5591794,00.html>, visited by 2007/8/20

7.3%的選民支持。前項數據顯示，極右派勢力在邦議會階層（尤其德東）有相當的潛力。國家民主黨在德東的支持度高於德西，主要肇因德國統一後的十幾年間，東區失業率過高。以 2002 年為例，德東五邦平均的失業率高達 17%，是德西的兩倍。長期失業者中的年輕人，受到激進政黨大力的挑撥和煽動下，將對政府政策的失望和不滿轉變為支持極右派的力量。國家民主黨趁機爭取到統一後社會失意者及權益受害者的支持，並大幅吸納新納粹分子，取得新納粹勢力的相挺，在這兩股勢力匯流下，而凸顯極右派政黨勢力的擴大。^④

極右派勢力在地方層級有所擴張，但為何無法更上一層樓擴展成全國性政黨，其因應為德國曾經歷納粹統治的慘痛教訓所致。部份原因也是德國各級政府基於推動「防禦性民主」的需要，藉由「護憲」（Verfassungsschutz）體系加強聯邦與各邦的緊密合作，進一步箝制極右派勢力崛起。^⑤極右派激進勢力從戰後德國戰敗迄今，始終未擺脫強調種族主義的思維，尤其德國統一後，因為東西兩部份整合不易，又受到吸納許多東（中）歐移民及歐盟開放邊界等因素的影響，導致經濟與社會不平等現象加劇，為極右派勢力竄出而塑造溫床。德國政府如果不能有效縮短社會貧富差距、解決競爭力不足、高失業率或福利削減等問題，極右派激進主義就不可能銷聲匿跡。

二、從政黨體系宏觀層面觀察政黨體系變遷

本節從邁爾的「政黨體系變遷」理論出發，轉從宏觀層面檢視德國政黨在主聯邦眾議院選舉，並爭取執政權力過程中，是否出現政黨體系變遷的情形？根據前述統一後的德國分歧和政黨的關係，可以獲致統一後德國的政黨體系有如下的特徵：

（一）「政府組成條件優先選項」逐漸改變

德國於 1960 年代創造出來的世界經濟奇蹟，曾經讓「經濟成長」議題主導了政黨的競爭型態；然而隨著社會變遷，1970 年代後逐漸崛起的綠黨，增加了政黨競爭體系中生態與和平永續發展的元素，並使之成為 1979 年以後，四大全國性政黨（基民聯盟、社民黨、自民黨與綠黨）黨綱分析中六大政治主題之一。^⑥但 1990 年德國統一後，鑒於德東與德西之間迄今仍存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差距，甚至在社會價值與民主政治的認知上都有歧異，如：德東人民多數仍少有後物質時代的價值，其價值仍多為物質時代與保守主義的思想。

學者福賀斯（Dieter Fuchs）與羅勒（Edeltraud Roller）從一項 1991 年至 2000 年有關東西兩區「對民主政治看法」的問卷結果說明：73%至 81%的德東人主張實踐具

註④ 葉陽明，「戰後德國極右主義、極右政黨對憲政民主之挑戰」，社會科學論叢，第 1 卷第 1 期（2007 年 4 月），頁 63。

註⑤ 聯邦層次上，以聯邦政府與聯邦議會及聯邦參議院均可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政黨違憲審查」，政黨若危害民主憲政秩序將受到「違憲政黨」黨禁處分。聯邦憲法保護局（Das 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則和「邦憲法保護廳」（die Landesbehörde für Verfassungsschutz），蒐集相關危害憲政秩序的資料與證據，並進行防護保密等合作。

註⑥ Tanja Binder and Andreas M. Wuest, "Inhalte der Europawahlprogramme deutscher Parteien 1979-1999,"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onn), B17 (2004), p. 40.

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民主，希望民主政治應該更強調平等正義，國家在人民生活條件的保障上應該扮演更積極角色。然而，德西人對此僅有 40% 至 51% 的支持度。德西人多認同自由民主主義，強調在個人自由競爭中實踐民主。不過，這樣要求公平正義的需求，卻因為 1994 年起全德失業率突破 10%（德東則於 1997 年突破 19%），長期存在著超過四、五百萬人的失業人口，加上政府因為社福支出嚴重，形成嚴重財政赤字問題，而開始轉變；聯邦政府思考如何開源節流，刪減過去優渥的社福支出，同時增加社福收入國民應分攤的比例費用，使得人民對政黨的支持方向有所改變。這也是選民對左派政黨勢力之支持度，在 1998 年稍早開始提升的轉捩點。

甚至可以說：各大政黨為了選舉獲勝，針對選民的需要，莫不在選舉黨綱中強調「福利國制度」的實現。但在現實上，左派各政黨相對於右派政黨在艱困的經濟情況中，比較容易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德國的經濟受制於長期結構性的不利因素，如：生產成本較高、社福支出高以及教育競爭力衰退，在經濟前景不明，不容易突破困境時，「保障就業機會」、「小幅度削減福利支出」、「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等較為左傾的政黨主張，實在遠比「創造就業機會」、「大幅度改革削減社福支出」、「自由競爭開放」的右傾意見要來得有吸引力，也因此左傾的意識形態與政見，成為影響選民投票判別政黨是否具有執政能力的關鍵因素。這點符合邁爾理論中「組成政府優先選項的轉變，亦即政黨之間對「福利國制度的實現」，已經重於「自由經濟競爭高度發展的實踐」，當然也是選民投票時的重要抉擇因素。

（二）「大聯合政府」為出現跨界社會分歧的表徵

拉方田 2005 年由社民黨出走，以更為左傾的立場與德東的民社黨合作，和 2002 年大選來比較，左黨在德西部分多得到 3.8%，德東部分則多了 15.8% 的得票率（見表 4），使德國的相關性政黨由四轉成五個，打破了聯邦層面原有兩大兩小政黨結構，成為兩大三小的格局，為此即使當左派政黨擁有過半得票，但以左黨表明不參與執政的協商時，所有的執政組合都將有跨越左右社會分歧的形式，如表 5 所示：

表 5 2005 年聯邦議會選舉德國各主要政黨的聯合執政的組合可能

	左			右	
	左黨（紅）	綠黨	社民黨（紅）	自民黨（黃）	基民/基社（黑）
黑紅	8.7%	8.1%	34.2%	9.8%	35.2%
黑黃綠	8.7%	8.1%	34.2%	9.8%	35.2%
紅黃綠	8.7%	8.1%	34.2%	9.8%	35.2%

資料來源：根據德國 2005 年聯邦議會選舉結果改編。

註 10 Dieter Fuchs, "Das Konzept der politischen Kultur: Die Fortsetzung einer Kontroverse in konstruktiver Absicht," in Dieter Fuchs, Edeltraud Roller, and Bernhard Wessels (Hrsg.), *Bürger und Demokratie in Ost und West - Studien zur politischen Kultur und zum politischen Prozess*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2002), pp. 32-36.

由此看來，左黨未參與選後各黨之間的協商，使得最小聯合政府無法出現。現今跨左右社會分歧的組合形式，是實際的政黨協商結果，大聯合政府形式，卻會讓執政聯盟的兩大黨要付出更多的代價，於其執政期間去整合各自政黨內部利益的衝突，除了政黨內部的矛盾會加劇，原來社會中的分歧代表性，也會為此受到很大的衝擊，增加政黨體系與政治體系的不穩定性。

過去左右政黨合組大聯合政府執政，僅有在 1966 年至 1969 年短暫的三年裡出現，當時的德國處於社會結構開始變遷的轉折期，原先社會中充滿親西方價值的情況，受到強烈挑戰，隨後德國進入後物質社會的時代。至於歷史上第二度出現的左右大聯合政府，是否在社會分歧上也呼應著某種「新分歧」的出現？持平而論，並不十分具體明顯。但 1990 年統一以來持續存在的社會整合問題，與後來歐盟加速整合所引進的歐盟深化與擴大問題，再遇上撲天蓋地而來的全球化趨勢，這些因素夾雜在一起，在德國社會碰撞後，讓德國最初的兩德統一融合的問題，與原本發展趨勢上面臨的後物質主義問題結合，就呈現相當特殊的德國政黨體系結構，所以筆者預測，若未來有新型的政黨分歧出現，目前會是在醞釀期，還待持續觀察；不然，目前的大聯合政府組合，在政黨體系中所意涵的，可能就僅是短暫社會危機情境下出現的政黨分合，猶如過去左派政黨中由共產黨分離出社民黨的意義而已，並非巨大的衝突分歧革命。

（三）新政黨進入政府的程度變得容易，該政黨體系的競爭性更為開放

1990 年以來，德國在短短 17 年當中，政黨體系已經由溫和三黨體系而於 1998 年變成溫 and 四黨體系，再於 2005 年因為左黨的態度，影響了聯合政府組成的形式，使左黨也符合相關性政黨中具備杯葛或影響政府組成的條件，這意味著此一政黨體系存在著五個相關性政黨。由於基民和基社聯盟、自民黨、社民黨、綠黨與左黨這些政黨在意識形態上，並不具備反對現有的憲政民主與社會經濟制度的特質，所以德國的政黨體系為一個意識形態溫和的多黨體系。德國統一後，17 年來的政黨結構變遷，亦可以顯示該政黨體系競爭性的開放；也因為政黨體系中的相關性政黨數目增多，成為聯合政府一員的政黨門檻也降低了，如此一來，選戰後組成聯合政府協商的複雜度增加，政治意見也變得多元。原本謹守共產黨思想的前東德共黨，能由民社黨，再與勞動社會正義黨合作，進而轉型為左黨，同時於穩固實力時合併，並積極準備於 2009 年大選中要向左派政黨龍頭的社民黨挑戰。

陸、結 論

從「分歧理論」的介紹開始，筆者整理出影響「分歧」的四大因素，分別為：1. 李普賽與羅坎為主的「社會階級衝突」2. 戴頓、英勒哈特和霍爾斯坦的「人口結構」、3. 英勒哈特的「社會價值」、與 4. 馮拜梅的「意識形態」，以之分析德國統一後的社會分歧變化，獲知以下的發現：

（一）由李普賽與羅坎的「社會階級衝突」檢視：此一社會分歧具有集體認同與組織性的利益表達衝突存在，德東與德西的區域利益，顯然在統一後的 2008 年仍然存

在，而這與「統一議題」，或由其所引起的高失業率、高財政赤字等問題相關，均是目前德國人最關心的利益衝突。

(二) 從人口結構檢視：統一是以東德加入原西德的方式進行，1,640 萬的德東人，與隨著德國統一與冷戰結束，德國接納並庇護許多外籍難民和非法外籍人口，總數達 700 萬之多時，兩者使新德國的人口結構和統一前的德國有相當大的差異；由於這些新加入人口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德東本身的發展程度都相對落後，因此從人口結構而衍生的社會貧富和隨之而來的價值差異問題，都形成了社會分歧。

(三) 社會價值：德東與德西在意識形態上的確存在差異，德西為有著為數眾多的中上層社會地位人口，反應著物質社會「消費者」、「擁有者」與「享受者」的基本價值，另有一部分人士，如知識份子則持有後物質主義的社會價值。相對地，德東以中低收入者為多，其結構中反映的社會價值顯示集中在兩大區塊，一為已受到西方個人主義影響深遠，以及以消費者價值自居的人群；另一則為堅守保守主義與前東德價值的人群，相較之下，東西兩區在基本價值上的確存在明顯差異性。

(四) 意識形態：在社會經濟發展的議題中，五大政黨中，包括右派的基民／基社聯盟，與自民黨對屬於左派的「建立福利國家」議題上，在其黨綱中有 94.4% 以上的內容都與此議題相關。這使得重視最低物質福利，強調公平正義與生活條件差異的整合，成為主流。在民主政治認知上，德東人重視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德西人看重的「自由主義民主」，形成了相當重要的意識形態差異。

綜言之，德國統一後，德東與德西之間的確因為之前截然不同的社經結構，形成以德東與德西兩個區域為主的社會分歧差異，但這樣的社會分歧卻不以德東與德西的地理差異為限，因為隨著人口的自由移動，與外籍人口的加入，這樣的社會分歧也隨之擴散到德西。加上德國面對統一後的整合問題、歐洲整合與全球化衝擊，這個最初以統一為肇因的社會分歧衝突，就以多層面的形式呈現在德國中，尤其透過各公共政策議題的不滿與改革要求來突顯，因此聯合政府面臨的挑戰十分嚴峻。

反應了前述德國的社會分歧，德國的政黨體系雖然仍維持溫和多黨體系的架構，但 17 年來其政黨結構已經出現顯著的轉變，首先，統一後的政黨分歧差異變多，綠黨、統一後的轉型的民社黨與隨之於 2007 年 6 月和兩年前成立的「勞動社會正義黨」合併而成的左黨，這兩黨均在統一後成為相關性政黨。二為政黨體系內由三個相關性政黨轉變為五個相關性政黨的情況，使得組織聯合政府的政黨協調變得較為複雜。

從微觀層面來分析德國統一後的政黨體系，其一，成立於 1980 年的綠黨崛起，並出現於 1998 年就執政的情況；其二，左派社民黨出現分裂及左黨的出現，它除擴大了德國左派政黨勢力，同樣也豐富了德國左派政黨的內涵；第三，極右派政黨於邦議會選舉嶄露頭角，反映社會中有著不容忽視的極端右派人士團體對當今社會政經體制的不滿。只不過，納粹時代慘痛的歷史背景、戰後民主教育的普及和德國政府護憲體系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積極維護，迄今仍讓極右派團體無法分得聯邦議會的任何席位。

至於政黨體系於宏觀層面上的轉變可以發現：首先，政黨執政的優先選項逐漸改變，由戰後致力於發展經濟為優先議題的情況，稍後「建立福利國家」議題受到凸顯並成為政黨政策之重點，而統一後如何在「經濟發展」、「福利國家」實踐過程中，

The Study of German Party System after Unification through the “Cleavage Theory”

Shu-pin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Before German unification in 1990, East Germany/GDR was authoritarian - governed by the 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 and West Germany/FRG was a democratic state with a relatively fair competitive party system. Serious conflicts between totally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must have emerged when they started to become a unified state. Differ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studying party systems through party numbers and ideologies, the author will, through “social cleavage,” examine how German parties reflect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fter German unification. In other words, cooperation, alignment and even dealignment among German parties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 German party system after unification will be emphasized in this research. To combine the changes of party system and classification of party system, readers will realize the reasons, contents and influences of the German party system after 1990. Finally a conclusion is summarized: the integration probably have formed a specific German social cleavage after unification.

Keywords: cleavage theory; German party system; party system change; German unification

參考文獻

- 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2006年1月）。
- 郭秋慶，德國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台北：志一，1996年4月）。
- 葉陽明，「戰後德國極右主義、極右政黨對憲政民主之挑戰」，*社會科學論叢*，第1卷第1期（2007年4月），頁33-93。
- Bartolini, Stefano,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Left, 1860-1980: The Class Cleav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Bartolini, Stefano and Peter Mair, *Identity, Competition and Electoral Availability: The Stabilisation of European Electorates, 1885-19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Binder, Tanja and Andreas M. Wuest, "Inhalte der Europawahlprogramme deutscher Parteien 1979-1999,"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onn) , B17 (2004) , pp. 38-54.
- Fuchs, Dieter, "Das Konzept der politischen Kultur: Die Fortsetzung einer Kontroverse in konstruktiver Absicht," in Dieter Fuchs, Edeltraud Roller/Bernhard Wessels (Hrsg.) , *Bürger und Demokratie in Ost und West -Studien zur politischen Kultur und zum politischen Prozess*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2002) , pp. 27-49.
- Gallagher, Michael, Michael Laver, and Peter Mair,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Modern Europe*, 4th edn. (New York: McGraw-Hill, 2005) .
- Geissler, Rainer, "Facetten der modernen Sozialstruktur," *Informationen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Themen: Sozialer Wandel in Deutschland (Bonn) , Band 269 (2004) , pp. 69-78.
- Geissler, Rainer, "Lebenssituation ethnischer Minderheiten," *Informationen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Themen: Sozialer Wandel in Deutschland (Bonn) , Band 269 (2004) , p. 40.
- Inglehart, Ronald and Avram Hochstein, "Alignment and Dealignment of the Electorat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Thousand Oaks) , No. 5 (1972) , pp. 343-372.
- Inglehart, Ronald,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Inglehart, Roland,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Kligemann, Hans-Dieter and Andrea Volkens, "Struktur und Entwicklung von Wahlprogramm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9-1998," in Oscar W. Gabriel, Oskar Niedermayer, and Richard Stoess (Hrsg.) , *Parteien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2002) , pp. 507-527.
- Lipset, Seymour Martin,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1960) .
- Lipset, Seymour M. and Stein Rokkan,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 An Introduction," in Seymour M.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eds.) , *Party*

-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 pp. 1~64.
- Lipset, Seymour Martin, "Cleavages,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Lauri Karvonen and Stein Kuhnle (eds.) ,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Revisited* (London: Routledge, 2001) , pp. 3~10.
- Mair, Peter, "Adaptation and Control: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Party and Party System Change," in Hans Daalder und Peter Mair (eds.) ,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London: Sage, 1983) , pp. 405~429.
- Mair, Peter, "Party System Change," in Richard S. Katz and William J. Crotty (eds.) ,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Thousand Oaks: Sage, 2006) , pp. 63~73.
- Mair, Peter, "Cleavage," in Richard S. Katz and William J. Crotty (eds.) ,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Thousand Oaks: Sage, 2006) , pp. 371~375.
- Mau, Steffen, "Soziale Ungleichheit in der europaischen Unio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onn) , B38 (2004) , p. 40.
- Mielke, Gerd, "Gesellschaftliche Konflikte und ihre Repraesentation im deutschen Parteiensystem. Anmerkungen zum Cleavage-Modell von Lipset und Rokkan," in Ulrich Eith and Gerd Mielke (Hrsg.) , *Gesellschaftliche Konflikte und Parteiensysteme. Länder- und Regionalstudien* (Wiesbaden: VS-Verlag, 2001) , pp. 77~95.
- Niclauß, Karlheinz, *Das Parteiensystem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ine Einführung*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2) .
- Niedermayer, Oskar, "Nach der Vereinigung: Der Trend zum fluiden Fünfparteiensystem," in Oskar W. Gabriel, Oskar Niedermayer, and Richard Stöss (Hrsg.) , *Parteien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Bonn: bpb, 2001) , pp. 107~128.
- Rokkan, Stein, in Peter Flora, Stein Kuhnle and Derek Urwin (eds.) , *State Formation, Nation-Building, and Mass Politics in Europe: The Theory of Stein Rokk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 Rokkan, Stein, *Citizens, Elections, Parties*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70) .
- Siavelis, Peter M., "Part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ichard S. Katz and William J. Crotty (eds.) ,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Thousand Oaks: Sage, 2006) , pp. 359~370.
- Urwin, Derek, "Political parties, societies, and regimes in Europ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litera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Oxford) , No. 1 (1973) , pp. 179~204.
- Van Deth, Jan W., "Deutschland in Europa: Eine Republik zweier Kulturen?" in *Deutschland in Europa: Ergebnisse des European Social Survey 2002-2003* (Wiesbaden: VS Verlag fue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4) , pp. 9~24.
- Van Beyme, Klaus, "Entideologisierung der Parteien und die programmatische Annaehrerung der Parteienfamilien," in *Parteien im Wandel* (Wiesbaden: West deutscher Verlag, 2000) , pp. 65~101.
- Wagschal, Uwe, "Parties, Party systems and Policy effects," in Paul Pennings and Jan-Erik Lane (eds.) , *Comparing Party System Change* (London & NY: Routledge, 1998) ,

pp. 62~78. 原刊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收錄於《中國政治學》, 1997, 1(1), pp. 101-117. 原刊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Ware, Alan; "The Party System in China: A New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
收錄於《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14(1), pp. 62-78.

